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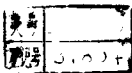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玉器

(下)



商務印書館



內 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下)

清代
主編：張廣文
商務印書館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縷諾 宿 白 張政娘
啟 功 蘇秉琦

總編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于倬雲 王樹卿 朱家治
杜進松 李輝炳 邵長坡
胡 鍾 耿寶昌 徐邦達
徐敏憲 單士元 單國強
許愛仙 張忠培 高 和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劉九庵 蔣崇正

主 編：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 任：徐敏憲
成 員：李輝炳 杜進松 邵長坡
胡 鍾 高 和 單國強
鄭珉中 蔣崇正 姜舜源
郭福祥 馮乃恩

總攝影：胡 鍾

玉器(下) Jade ware (III)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編 ····· 張廣文
副主編 ····· 周南泉 張壽山
編 委 ····· 宋德汗 楊 杰 趙粹玲
攝 影 ····· 胡 鍾

出 版 人 ····· 陳萬桂
編輯顧問 ····· 吳 寧
責任編輯 ····· 安若蘭 陳 杰
裝幀設計 ····· 三易設計有限公司
出 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觀彌敦道2號2樓大電
製 版 ····· 晶明製作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30號新都城大廈C2536室
印 刷 ·····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 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199 X

版權所有 不准以任何方式 在世界任何地區 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1995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Kin Yung Building 2D Prince Street, Queens Bay, Hong Kong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總序

楊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72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樂皇帝朱棣下詔將北平升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舊宮的基址上，開始大規模營造新的宮殿，公元1420年宮殿落成，稱紫禁城。正式遷都北京。按古老的禮制，紫禁城內分前朝、後寢兩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輔以文華、武英兩殿。後寢包括乾清、交泰、坤寧三宮及東、西六宮等，總稱內廷。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國統治，仍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內。明、清兩代，從永樂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儀，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這裏。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將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部分文物移來，在紫禁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1924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1925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珍奇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 and 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不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

了清點、事後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28冊，計有文物117萬餘件（套）。1947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於1948年底至1949年被運往台灣，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有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711338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1200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1949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1994年底，計有222920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著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著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

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著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同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愈來愈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1995年8月30日於燈下



中國玉器年代表

清代

公元1616-1911

天命	1616-1626
天聰	1627-1643
崇德	
順治	1644-1661
康熙	1662-1722
雍正	1723-1735
乾隆	1736-1795
嘉慶	1796-1820
道光	1821-1850
咸豐	1851-1861
同治	1862-1874
光緒	1875-1908
宣統	1909-1911

導言

張廣文



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間，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經

歷了巨大變化。其間有北方民族文化與中原傳統文化的融合、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領域中的新探索。這些對藝術與工藝美術的發展，包括玉器的生產、使用和收藏無不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古代玉器經過漫長歲月的發展，形成了獨立的用玉體系和傳統。明代晚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玉器的使用與收藏已相當普遍，出現了研究與收藏的熱潮。明末清軍南下，社會騷動不安，百業俱廢，玉器生產一度低落。清王朝一統天下後，歷順治、康熙數十載，勵精圖治，經濟與文化得以恢復和發展，為宮廷玉器的收藏、製造和使用創造了條件。乾隆時期，宮廷中更重視古玉收集、精研用法及以玉製造生活用具，宮廷玉器發展蓬勃。清宮所遺古玉及用玉，大都是在乾隆時收集整理或製造的，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嘉慶時期。清後期，民間製玉業發展，玉器生產的重點自宮廷轉到民間，而宮廷玉器的生產能力及工藝水準皆不如前，逐漸衰落。

清代宮廷玉器的孕育

清代玉器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滿族原是遊牧民族，崇尚武力，靠軍事力量奪取天下，建立了清政府。但是在文化方面，清統治者企圖採用本身民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政策卻遭失敗。面對漢族的優秀文化，清統治者最終採取了承認、學習和利用的態度，使北方民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走向融合，而兩方民族的用玉傳統也趨合流，出現了清代宮廷的用玉體制。順治、康熙時期是清代宮廷玉器的孕育期，目前有關這時期玉器使用情況的文獻及實物材料雖不多，但人致脈絡尚可辨識。

在現存的文獻中，記載康熙以前清代玉器的使用及生產情況的資料非常少。而在清代宮廷遺

玉中，至今尚未發現有康熙年款的作品，顯示康熙時期宮廷玉器的製造，似落後於其他類別的工藝品。因此，康熙及其以前，社會上收藏玉器和使用玉器的情況如何，清宮廷是否重視玉器，以及這一階段玉器的生產製造情況，一直是古玉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

經過皇太極、順治等時期的努力，清初社會經濟已得到恢復和發展。順治、康熙年間，百業俱興，生機勃勃，藝術品及工藝品的製造，在品種和數量方面都有很大發展，尤其是康熙時期，有些工藝品的製作水準甚至超過了明代中晚期。康熙時期瓷器、琺瑯器、絲織品以及傢具都有表現。這些工藝品中，很多都有康熙年的製造年款，是典型的宮廷用品。就整體社會而言，玉器的使用與其他工藝品一樣，是同一經濟模式及文化傳統的產物，因此在發展上不會與其他工藝品有很大的差距。事實上，在清朝初年，社會上已出現了收藏古玉的風氣。康熙年間，孔尚任在《享金簿》^[1]中記述了他所見和收藏的古玉，其名目有“漢玉笛”、“宙公斧”、“古玉荷葉洗”、“白玉螭瑗”、“碧玉小瑗”、“漢玉環”、“碧玉羊頭”、“漢玉鷹揚瑗”等。其中並記：“漢玉笛……予得於越人余敘庵，錦囊橐篋固守為重寶，不啻天球矣。”1962年，在北京西郊小西天師範大學工地施工時，發現了一處康熙十四年下葬的滿族貴族墓葬，墓中所葬是大臣索額圖之女。隨葬器物中有諸多玉器，其中有“子剛”款玉樽、花形玉佩等前代作品，也有白玉雞心佩、碧玉雞心佩等康熙時期作品。還有一些玉器為唐宋時所製^[2]。這一墓葬中的隨葬玉器並非臨時應製的明器，而是索氏家族的藏玉。其中的仿古雞心式玉佩，是清代製造的實用玉器，可能為墓主生前所佩帶，這就說明清初部分滿族貴族的藏玉和用玉觀念與漢文化的傳統觀念相一致，並佩用漢文化傳統的仿古玉器。

在清宮遺存文物中，保留了漢文化傳統的用玉觀念。順治時使用的玉譜冊及玉璽，與歷朝禮制傳統一致，但器型粗笨，表現出使用者不求工藝雕飾而偏好玉質的傾向。清宮遺存中有“康熙十七年劉源恭造”款的寶璽^[3]，這類寶璽分為三月所製及五月所製。三月所製是為康熙萬壽生日所貢，璽以十四笏為一組，形態各異。有昭示天下太平者，有以龍頰德者，有珍玩秘寶之形者。其中一笏為“蒼璧”，一笏為“玉佩”。蒼璧璽為璧形，璧是禮器，是祭祀活動中禮天的重器。“玉佩”璽為玉劍璏之形，清代把它稱之為璏，是宋代之後最受青睞的玉器。“璏”與“歲”諧音，常用於祝壽。劉源以玉器為璽形，為康熙生日貢，由此可見當時宮廷對傳統玉器的重視。

清宮遺玉中，有兩類典型的康熙時期玉器，一類是在玉器附件上刻有御製“玉杯記”的仿古玉器，“玉杯記”為乾隆所撰，記玉工姚宗仁指認該玉杯為其祖所製，並道明燒古做舊之法。

姚宗仁於乾隆初年即在造辦處供職，其祖應為清朝初年人物。這類帶題記的玉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存有三件，台北故宮博物院亦存類似風格的器物。第二類玉器以一件白玉碗盒為代表。在有款識的康熙年製硯中、有嵌有玉或瑪瑙的硯盒，其中一件為鐘式硯，松花石製成，硯上有白玉蓋，硯下有白玉座，合而成盒，其間幾無空隙。其硯不似為配盒而製，硯、蓋、座應為同時的作品。白玉碗盒上有凸雕的篆字詩句，末署“子昂”。類似風格的琢有“子昂”款詩句風格的玉器在宮廷遺玉中亦見，這類作品同明代琢有文人詩句的玉雕作品不同，多數是康熙年製造的宮廷玉器。另外，明晚期文人官宦中盛行撫琴之風，影響到清初的工藝品造型，康熙年名家製墨中多有琴式墨，清宮遺玉中亦有小型的琴式玉盒，風格與一般明代玉器有別，也可能是康熙時作品。這幾類作品皆有小巧精緻，光澤明亮、棱角圓潤的特徵。上述情況說明在清朝初年，宮廷玉器已開始起步，且具一定規模。

清代宮廷玉器的發展

1723年，世宗繼位，年號雍正。雍正初政使面臨政治、經濟方面的複雜局面，政事繁忙，本無暇顧及宮廷玉器的收藏與使用，但由於康熙年間經濟的發展與官僚體制的形成，官僚收集古玉和以玉為貢已成風氣，地方玉器不斷進入宮廷，致使雍正任理政之餘，也收藏玉玩，裝點宮室。雍正年製造的玉器，帶有製造年款的不多，僅故宮博物院存有少量作品。目前，全國博物館及個人收藏中，能確定為雍正年作品的玉器數量很有限，這就給研究雍正年玉器，尤其是宮廷玉器的使用情況帶來困難。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清代檔案中，有雍正年間各級官吏向朝廷進奉的禮單，和雍正年造辦處製辦宮中用品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從這些檔案得以了解雍正時期宮廷玉器的一些情況。

雍正時期，宮廷造辦處設有多項工種，各作坊稱為“作”，如銅作、漆作、匠作等，還有玉作。其中諸多作坊都作業頻繁，如琺瑯作製造銀茶壺、漆作製造如意式黑漆盤、銅作製造天然竹節如意等。與銅作、漆作、匠作等比較，玉作的生產能力顯然是十分有限的。造辦處玉作所承擔的活計，主要是玉器收拾、改做，刻款等小修小改項目，很少有製造成品活計。玉作活計清檔所記內容，主要為收拾玉器。如雍正五年九月十一日記：“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十日，郎中海望持出青玉荷葉式雙喜杯一件，白玉雙圓龍頭靶杯一件，青玉方形靶杯一件，白玉八角靶杯一件，青玉方形靶杯一件，白玉腰圓獅虎靶杯二件，漢玉方足靶杯一件，白玉乳丁圓形靶杯一件……奉旨。玉杯大小十件，著照杯的樣式配硯，其琉璃頭有不好之處俱各收拾。欽此。”^[4]所謂收拾，是在原作品上加以修飾，提高工藝水準。改做是將原有玉器改變形態，製成其他器物。如雍正六年玉作活計清檔記九月初六日：“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月初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白玉心猿意馬一件，隨紫檀木座。奉旨。將上面的猴蛇去，改做





筆架用。欽此。^[10]類似的改做玉器的活計，在造辦處檔案中還有許多記載。從檔案中還可看出，雍正年間，造辦處玉作已有少量玉器的製造，如造辦處活計清檔記雍正五年十月十二日：“做得銀提油墩一件，隨鍍金靶銀杓一件，共重五錢四分，郎中海里呈進。奉旨：著照此樣做玉提油墩一件，其靶子用磨玉筷子做。欽此。”^[11]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做得……”。這裏所言提油墩不知何形。銀製品與杓共重五錢四分，想必不會太大。照做的玉提油墩應屬小件玉器。自十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費時兩月有餘，製造時間頗長，可見造辦處玉作的生產能力是較低的。造辦處是宮廷玉器的主要提供者，它所承辦的活計以收拾、改造為多，只能進行少量的製造，另外還有玉器採辦，以滿足宮廷用玉的需要。

宮廷玉器的另一來源是地方的進貢。貢品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宮中必要的日常用品，一類屬珍寶玩賞類器物。在珍寶玩賞類器物中，玉器佔有相當數量，這一點在雍正時期宮廷進單中有所反映。如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長蘆巡鹽御史鄭禪寶所進器物中，就有銀品花瓶成件，百乳玉鼎成座，萬年玉瓶成件，交泰玉盒成件，雙喜玉譜成件，……漢玉筆山成件，壽鳳玉罐成件，脂玉花囊成件，脂玉水注成件。^[12]鄭禪寶於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又貢入類似的玉器多件，如“脂玉鼎爐成座，碧玉梁宮成架，脂玉花囊成件，銀品花樽成件，碧玉花插成件，玉龍鳳樽成件，漢玉筆山成件，白玉花插成件……”。^[13]前後兩份進單相距不足三年。貢玉的頻繁，反映出宮廷的玉器需求，也道出玉器自社會流入宮廷的情況。

目前見到帶有雍正年款的玉器僅有杯、洗、碗、仿古鹿盧環等，品種單調。實際上，雍正時期宮廷使用的玉器品種異常豐富，遠非上述幾種。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伊拉齊同朝廷進貢的器物中有玉器21件，主要品種如下：“萬年一統玉尊，九王一統玉尊，九如水晶尊，瑞芝碧玉尊，吉慶有餘玉盤，白玉如意，碧玉如意，白玉花插，紫晶壓紙，白玉圖書盒，碧玉兩管瓶，白玉筆洗，雙玉臂攔，玉匙箸籠，白玉榻床，白玉水丞，白玉合符，白玉連環，碧玉花插，白玉筆架”等。^[14]主要是陳設品和文房用品，有些還屬大件玉器。從名目上看，並非“漢玉”和“舊玉”主要是時作玉器。這類進單顯示，雍正時期宮廷玉器的使用量已很大，品種也十分豐富。

清代宮廷玉器的鼎盛期及其出現的原因 清中期，經濟與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宮廷玉器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新疆地區準葛爾部和回部的動亂，新疆玉料大量進入宮廷，解決了長期阻礙玉器發展的原料問題，宮廷玉器生產出現了繁榮局面。

在乾隆時期的宮廷用玉中，新製玉器大大超過了舊玉和傳世玉，玉器品種激增，大型玉陳設品不斷出現，玉器皿出現了批量生產，宮廷組織生產的玉器成為用玉的主體，宮廷收藏的古玉也形成了系統和規模，使宮廷玉器的發展進入了鼎盛期。推動這期玉器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社會盛行用玉藏玉之風

縱觀歷史，歷代玉器使用的鼎盛期，皆出現於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時期。收藏與使用玉器是經濟充裕後人們普遍追求的習尚。而清代康乾時期蓬勃的經濟就助長了玉器的發展。前面已經分析過，收藏古玉之風在康熙時已在社會上出現，及至乾隆時期，此風有增無減。在官宦之間更為崇尚，特別對一些小玉件渴求甚殷。若玉上有鮮活斑點、天然蘊色，更是身價倍增，千金難買。紀昀在《閩微草堂筆記》中記有小玉件的買賣情況：“嘗見買人持一玉簪，長五寸餘，圓如畫筆之管，上半純白，下半瑩澈如琥珀，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堅不肯售。”^[10]“見董文恪公一玉蟹，俱不甚巨，而純白無點瑕，屬視之亦常玉，以它白相比，則非隱青，即隱黃隱赭，無一正白者，乃知可貴……以六百金轉之矣。”^[11]從這兩件小玉件索價的情況看來，當時的玉器確是價值不菲。由於古玉市場的擴大，玉器的仿古作偽及鑒別真假的研究也發展起來，有關玉器的文章書籍相繼而出。乾隆親自撰寫的《玉記》就是在識別玉器時的有感而發，所記着重於姚宗仁所述古玉做舊之法，又兼識別之竅門。乾隆之時，學術領域中考據之風盛行，在乾隆授意徵集散佚書籍時，又冒出了一部署名宋人趙大淵的《古玉圖考》。此書收錄玉器數百件，多數器物似古非古，怪誕不經，並逐件考據、洋洋大觀，言之鑿鑿，也反映出人們對古玉的追求和學術領域對古玉的重視。

（二）帝王崇尚，推波助瀾

乾隆對古玉的收集和研究推動了宮廷藏玉的發展，他利用宮廷的財勢，興玉器收集、考據、研究、製造之事，玩玉器於股掌，置玉器於高堂而管領風騷。

關於古玉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乾隆對所知道的著名玉器，想方設法也要收羅宮中。其中以收集濱山大玉海最為聞世^[12]。濱山大玉海為蒙元宮廷所製，歷經倉桑而流落民間，成為道士的藥盆。乾隆使人以銀易之，納入宮廷，後又多次進行修整。乾隆收集古玉的興致為臣下所知，不少臣屬逢迎其意，廣徵古玉，貢入宮廷，使宮中藏玉不斷增加。例如淮安關監督寅首於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所進舊玉，計有六十二件，數量不少^[13]。乾隆初年已就收集到的古玉分類收藏，造辦處檔案記載了乾隆三年的一次玉器整理情況：“太監毛團、高玉交洋漆匣一





件，內盛珊瑚匣四十件，共盛各色玉器七百六十二件。傳旨：將此箱內玉器按次序名色寫一琳琅笥榻子盛在箱內。欽此。”^[10]“于本月二十九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將洋漆箱一件，內盛玉器琳琅笥本紙榻一件，交大監胡世杰，高玉呈覽。奉旨：此榻子不好，照寶笈榻子樣做磁青紙榻一件，榻面上寫乾隆戊午集成，其玉器另著人認看名色，準時。著梁詩正寫。欽此。”^[11]這次整理涉及的七百多件玉器雖僅限於認看名色，分類裝箱，登記造冊等事項，卻使管理條理化、系統化，把古玉收藏納入正軌。

其二是對古玉進行研究和鑒別。現存的乾隆御製文中有專門討論古代用玉制度及玉器形制的《御製搢圭說》^[12]和《御製圭瑱說》^[13]，還有識別古玉的《古玉斧佩記》^[14]。乾隆御製詩中，有八百多首是詠玉器的，其中詠漢玉、宋玉、舊玉、古玉的作品佔了相當數量。這些詩句及其所附注釋，不僅敘述了古玉的歷史，同時還指明玉器的時代、名稱、用途及鑒定與評價，其中有些是十分準確的。這些並非乾隆一人之能，而是代表了當時清宮廷對古玉器識別的整體水準。在清宮遺存的明代以前舊玉器中，有很多作品或附件上帶有御製鑒賞詩句，絕大多數是乾隆時期琢刻，從中顯示乾隆時期對各種玉器收集、研究、鑒別的情況，為其後各期古玉收集打下了基礎。

（三）宮廷玉器生產體制加強及擴展

雍正之前，由宮廷直接生產的玉器數量不多，只是集中供應宮廷用玉。就整體社會而言，玉器生產的主流卻不在宮廷。乾隆時期，宮廷使用的玉器，除古舊器物外，主要由宮中作坊製造，生產數量劇增，工藝水準也有提高，而生產供宮廷用的玉器，也漸成為玉器行業的主流。這段時期宮廷玉器生產的特點，主要是玉器生產力的加強，並控制了玉材的來源。

據現存檔案資料，雍正時期的造辦處玉作，主要活計是外來玉器的改做和修飾，而在宮中琢製和採辦的玉器則很少。乾隆初年，造辦處調整規模，加強了玉器製造的組織管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造辦處設立如意館，選調玉匠好手進館工作。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五年三月的一次工匠挑選：“記事錄，十一日，司庫圖拉郎正培奉旨，挑老誠些好手玉匠一名進如意館做活計。欽此。于本日圖拉郎正培……內大臣海望隨挑得玉匠姚漢文進內承差。記此。”^[15]乾隆年間，造辦處玉匠不斷補充，當時的蘇州是南方玉器生產中心，技術力量雄厚，宮中玉匠多自蘇州選入。如乾隆二十六年，“于五月二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寅著將蘇州送到



玉匠張君選一名……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杰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20] 造辦處所用玉匠：除蘇州選送外還有北京匠人，滿族八旗的家內匠和回子玉匠等。有時造辦處因治玉“玉匠短少，活計甚多”通過太監胡世杰轉奏，得到御批：“准計外僱幾個匠役成做”^[21]；而從各方臨時招聘工匠。

第二，造辦處承擔了部分宮廷玉器的設計工作。造辦處中有一批能設計玉件的治玉高手，而重要的作品就需要由清宮內奉職的畫家繪圖、先製小樣，呈覽獲准後才能製造。如乾隆九年四月“如意館……玉匠姚漢文畫得節活吹虎羅漢陳設一張、呈覽奉旨准做。欽此。”^[22]

第三、向各地區分派任務、動用各地力量為宮廷製造玉器。這一時期，宮廷直接控制的玉作有十處之多，除宮內造辦處玉作如意館外，為宮廷加工玉器的有蘇州織造、兩淮鹽政、長蘆鹽政等；另外江寧、淮關、九江、鳳陽、杭州等地也曾為宮廷製造玉器。”^[23] 在乾隆的督導下，宮廷玉器的生產力大大加強，製造數量迅速提高。乾隆二年，在玉材供應短缺，玉器加工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造辦處奉乾隆旨意，一次就向蘇州織造交白玉帶板二百塊、青玉帶板五十四塊，“傳旨：著交與織造海保處，仿古款式花紋酌量做佩、璧、環、玦、合符、三、四層狀盒，不必甚急，陸續送來。欽此。”^[24] 同年七月初四日蘇州織造海保送抵成品二十件，七月二十七日十件，九月初二日二十件，九月二十八日二十四件，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件，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件，次年二月十九件，計有一百三十三件。一年之內，蘇州為宮廷製造了玉器133件，數量遠超雍正時期。這一時期新疆地區動亂尚存，玉材不能大量進入內地，玉器製造仍處於低潮，宮廷尚能如此大量製造玉器，爾後盛況更可想而知。乾隆二十四年，新疆地區的動亂平定後，玉料大量進入內地，宮廷玉器的產量急劇增加。所製器物以陳設、日用品為主，體積較大，工藝更為複雜。據推算，此時宮廷玉器的年生產量，最高達到二百件以上。另外乾隆時期還製造了數量頗多的大件玉陳設，其中不僅有高達數尺的大插屏和仿古大玉瓶，還有重達數千斤的玉山和玉壺。乾隆四十一年之後，相繼雕造了大禹治水圖玉山（重逾萬斤）、南山積翠玉山（玉料重約三千斤）、秋山行旅玉山、會昌九老玉山及雲龍玉壺（玉料約重五千斤）等。大件玉陳設的製造，使宮廷玉器的產量和規模達到了空前的發展。

（四）新疆玉材資源豐厚

中國古代治玉的主要原料為陽起石，屬透閃石族礦物，這類玉料多產自新疆和闐、葉爾羌地區。清代所用玉料也主要來自這兩個地區。新疆玉材按採撈方式可分為河產玉及山料玉兩

種。河產玉又稱籽玉，撈於河中。張世南《遊宦紀聞》中說：“每逢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151]河中玉料由於隨水奔流而相碰撞，有縫隙的則多已裂開，所餘之材質地較好，但體積較小，多呈卵狀。山料玉採自山上，玉料較大但多皸裂。著名的大禹治水圖玉山，玉料重逾萬斤，採自新疆葉爾羌密勒塔山。乾隆二十四年前，由於準葛爾部割據，控制了和闐、葉爾羌地區，新疆玉料難以大量進入宮中，限制了宮廷玉器的生產。平定準葛爾部後，新疆玉料得以大量進入宮廷。據道光元年抄載，“新疆平定後，和闐、葉爾羌一處，每年進到玉了四千餘斛。”^[152]這段時期宮廷控制了新疆玉的開採，主要供宮廷玉器生產專用。“十八世紀清統治新疆後，官府壟斷玉石開採，嚴禁當地羣眾或商民採集或販賣玉石，每年秋季，葉爾羌辦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報開採情況並進貢玉石。”^[153]乾隆所撰《詠和闐大玉碗六韻有序》中有“二萬里溯勤拓地，德昭宵吁之籌，三十年久效勞波，心底春秋之貢，懲營私而庸臣抵罪，牟重利而市賈爭趨，維誰何必謹於岩關，而甲乙究歸於天府。”^[154]乾隆序文反映出當時官商對於玉料的態度。乾隆《乙酉題和闐玉碗詩》中又有“和闐包貢歲頻來”之句，說明和闐之玉每年都要貢入宮內。關於貢玉的數量，宮中奏折所記：“乾隆三十年和闐所屬哈拉圭塔克採玉三十五塊進貢”，“乾隆三十五年春，和闐玉雕哈什河、哈拉哈什河採獲玉石進貢的有玉一百五十八塊，白玉一塊重十二斤”，“乾隆三十三年秋季分和闐玉雕哈什、哈拉哈什二河採獲進貢玉二百二十八塊，白玉一塊重十五斤。”^[155]新疆地區玉料進入宮廷的主要途徑是買入，每年分為春秋二次，從乾隆二十五年至嘉慶十七年共五十二年，平均每年四千餘斤，共計貢進內廷的玉石多達二十餘萬斤。^[156]另外，朝廷還依據需要，經常派專員去新疆採辦玉料，乾隆年間系辦玉簪材料使是典型事例。清代宮廷使用的玉簪分為特簪和編簪兩種，特簪每分十二面，編簪每分十六面，所用玉料較好，而且較大。如黃鐘一面：“股修一尺四寸五分八厘，股博一尺九分三厘，鼓修二尺一寸八分七厘，鼓博七寸二分九厘，厚七分二厘九毫。”^[157]這種玉器不能有柳裂，否則會影響簪的音色。宮廷需用玉簪多，地方貢入之玉不能滿足需要，清廷便派專員赴新疆採辦。乾隆四十一年“太監胡世杰傳旨：問鄭景德……挑得玉簪料有無有。欽此。隨據鄭景德說銀庫內之玉，足做編簪者有，但顏色玉清不一，又兼具有柳道石性，俱使不得等語。回奏。奉旨：著傳與額爾福，將從前跟德魁去過之人派往葉爾羌辦玉簪料。欽此。”^[158]類似的採辦在乾隆朝還多次進行。由於清廷控制了玉料來源，為宮廷玉器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兼之有效的行政組織，致使宮廷玉器的製造在乾隆時取得巨大進展。

在宮廷玉器取得巨大進展的同時，一支異軍突起的痕都斯坦玉器也進入了清代宮廷。乾隆所撰《天竺五印度考託》謂：“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蔥嶺，



即撥達克山、撥達克山轉而南為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都斯坦……”^[1] 清代所有溫都斯坦或痕都斯坦，位於印度北部，包括克什米爾及巴基斯坦部分地區。清代宮廷將來自印度土耳其及部分中亞地區的玉器統稱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玉器於乾隆年間大量進入清宮內廷，有碗、盤、壺、盒等器皿及刀把、鏡把、經架等用具，品種很多。痕玉的製造非常精緻，一般具有下列特點：（1）造型奇特，呈多瓣形、葉形、橄欖形等植物形狀；（2）胎薄如紙，微透明，體輕如葉；（3）裝飾圖案細碎緊密，滿佈器面，多為花葉紋；（4）嵌施工藝精臻，或嵌金線，或嵌玻璃，或嵌彩石，色彩艷麗奪目，與底色對比強烈。乾隆非常喜愛痕都斯坦玉器，使用並收藏了大量痕玉作品，還留下了約六十四首詠嘆痕玉的詩句，其中對某些器物的評價，甚至高於中國玉器^[2]。

清代宮廷玉器的使用

清代初至乾嘉時期，宮廷對玉器的需求一直上升，到了乾隆期至嘉慶初年，宮廷已儲有大量玉器，使用範圍非常廣泛，涉及種類亦甚繁多。

（1）冊與寶

冊為玉版聯結而成，版上刻文記載重要事項，常見的有封冊、徵冊、誥冊等。據《清史稿·禮七》載：“冊寶初製用金，康乾時兼用嘉玉，道光後專以玉為之”^[3]。除冊封用途之外，還有大量刻有清帝御製詩、贊、記、題等文字的主詩文冊。另外宮廷重寶、天子印璽也大量使用玉製，乾隆十三年定交泰殿二十五寶中有玉寶，而清帝所用玉製關章就更多了。

（2）祭祀

清代宮廷的祭祀活動很頻繁，有闕丘、方澤、祈谷、太廟、社稷的大祀，日、月、天神、地祇、歷代帝王等中祀，還有羣祀。祭祀中有祭物、樂舞、隆重的禮儀，並常常使用玉器。祭祀用的玉器有璋，琥，璧，琮，爵，還有禮樂所用的磬。據乾隆時《皇朝禮器圖式》載，璋最初用於王朝日壇：“舊制朝日壇用赤璋，形制不符，且非以祀日，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朝日壇用赤璧……”^[4]。琥曾用於夕月壇：“舊制夕月壇用白琥……乾隆十三年欽定祭器，夕月壇用白璧……”璧除用於朝日壇，夕月壇外，還用於天壇正位：“本朝定制，天壇正位用蒼璧……”玉爵用於太廟，乾隆十三年前還曾用於天壇正位。祭祀活動中要進行樂舞，而演奏中和韶樂，玉磬是不可缺少的樂器。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十六年曾做主特磬，“以為圓明園、紫光閣二處樂器內換用”，“換下之玉磬著交熱河樂器內換用”。乾隆三十七年，“再查……圓丘壇城處內舊有玉編磬三分，新造六分，系青玉新造，又朝日壇等十六處特磬系新造……”乾隆四十年，“查原奏採辦寧壽宮內中和樂器二分所需青玉特磬二分計二十四面，編磬二分計三十二面。”^[5] 這說明了圓明園、紫光閣、寧壽宮、熱河文廟、圓丘

